

· 文献考论 ·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馆词林》版本述略

刘 育^{1,2}

(1.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2.青海大学教务处 青海西宁 810016)

摘要:《文馆词林》是唐人许敬宗编纂的千卷诗文总集,可惜宋初就已亡佚,到元修宋史时仅有1卷见载。十九世纪伊始,日本学者首先刊布了此书的4个残卷,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后国内学者纷纷依靠各种途径或搜求、或翻刻,使越来越多的残卷重现于世,由此形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版本系统。经考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一系统内的所有版本。文章在实际接触各本的基础上对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馆词林》的各个版本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以供相关研究者同好。

关键词:《文馆词林》; 版本; 残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ditions of *Wen Guan Ci Lin* Collect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Wen Guan Ci Lin*, a 1000-volume anthology of poems and essays compiled by Xu Jing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been lost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was left with only one volume when the Yuan Court compiled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s first published four remnant volumes of the book, which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Later on, Chinese scholars spared no effort to gather or reprint the book, and more and more volumes were discovered, hence forming a sequenced edition system. As a matter of fact, all the editions of the book were collect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paper, based on a first-hand investigation,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very edition of *Wen Guan Ci Lin*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scholars.

Key words *Wen Guan Ci Lin*; edition; remnant volum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1 引言

《文馆词林》是唐初编纂的一部诗文总集,据史料记载,其成书时足有千卷之多^[1]。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容量不成正比的是,洋洋巨帙似乎并没助此书占据文学史上的要席——相较于以60卷之姿态便名扬古今的《昭明文选》而言,这部后出之作反而寂寥了许多。究其缘由,各种客观原因造成古籍在流传过程中迅速湮没,以至于散失殆尽,可谓是致命症结。

且看阮元为其所见残卷写作提要时,就曾如此勾勒过个中情形和变化:“《文馆词林》四卷,唐许敬宗

等奉敕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官至太子少师。咸亨初,以特进致仕,事迹具《唐书·奸臣传》。案:宋王溥《唐会要》云,显庆三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与《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卷帙合。《志》又云,崔元暉注《文馆词林策》二十卷。又杂传类载《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宋史·艺文志》载《文馆词林诗》一卷,《崇文总目》载《文馆词林弹事》四卷,皆全书中之一类。是编亦仅存六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汉魏以来之诏令,日本人用活字版摆印者。”^[2]自唐至元,这个从千卷化为1卷的数量落差无疑是触目惊心的。而如果不仅限于正史的著录,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不幸很可能早于元为其修史的宋朝就已经发生了。关于这一点,已有学

者做过较为详细的论断,兹不赘述^{[3]2-3}。

总而言之,《文馆词林》一书在本土的亡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时今日人们得以窥见其貌,多赖于若干残卷不断自海外浮现以及数辈中外人士投入其中的努力。

2 现存《文馆词林》的版本情况

日本学人林衡在宽政十二年(1800年)以木活字刊印《佚存丛书》,其中收录《文馆词林》卷662、664、668以及695等4个残卷,可说是该书重见天日之滥觞。

咸丰三年(1853年),南海伍崇曜刊刻《粤雅堂丛书》,其中《文馆词林》的部分即是本于《佚存丛书》而来。其后由黎庶昌主持刊刻、完成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古逸丛书》本,收有《文馆词林》14卷(分别是卷156~158、347、452、453、457、459、665~667、670、691、699)。9年之后,杨葆初又刊刻了宗亲杨守敬得于日本友人、内容溢出之前各本的5卷《文馆词林》(卷152、346、414、665、669浅草文库藏)。

二十世纪以来,董康数访日本,也先后携回有关此书的各种消息和资源,其成果一方面体现于民国初年张钧衡刊刻的《适园丛书》;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将亲眼所见之《文馆词林》唐写本复制回国,使尘

封千余年的古书以原貌重现故土。董氏曾在日记中专撰《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一文,叙述其中的来龙去脉。其文曰:“……余于辛亥侨寓京都,曾借大学藏大觉寺传录本。与《佚存》《古逸》、成都诸刻互勘,纠正讹舛,不可枚举,并溢出卷一百六十、三百四十八、卷六百六十四之后半、诗四首、又残卷二,南浔张石铭刻入《适园丛书》中。……癸亥春仲,欧墨归航,扶桑重到,忆及森立之《访古志》谓是书真本藏高野山,乃偕京都擅名写真制版之小林忠次亲诣是山,果于灵宝馆访获十九卷。……间有数卷后有跋云:‘校书殿写,弘仁十四年岁次癸卯二月为冷然院书’,并钤‘冷然院’朱印。冷然院乃储御书之所,弘仁为嵯峨天皇年号,十四年当唐穆宗长庆三年。……原本久经编列国宝,世人罕睹。余嗜古癖深,介内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许可,用泾县净皮佳椽挽小林氏印制百本。”^{[4]70-71}

由此观之,以上诸家的访书、刻书,既是对《文馆词林》传承有序的辑佚过程,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一个颇有源流的版本系统。简言之,分别有4卷的《佚存丛书》本和《粤雅堂丛书》本、14卷的《古逸丛书》本、5卷的浅草文库本^①、23卷的《适园丛书》本以及董康所见的日藏弘仁本。经比对,这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文馆词林》残卷,版本恰可一一相合(见表1)。

表1 《文馆词林》残卷版本源流对照表

编号	题名	出版信息	版本类别	所属系统
1	文馆词林:存4卷	日本	影印本	《佚存丛书》本
2	文馆词林:残4卷	清光绪8年(1882年)长洲黄氏	木活字本	
3	文馆词林:残4卷	民国13年(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影印本	
4	文馆词林:残4卷	民国13年(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影印本	
5	文馆词林:残4卷	日本宽政至文化间(1789—1817年)	刻本	
6	文馆词林:残4卷	民国13年(1924年)上海涵芬楼	影印本	
7	文馆词林:残4卷	清咸丰3年(1853年)南海伍氏	刻本	《粤雅堂丛书》本
8	文馆词林:存15卷	清光绪10年(1884年)遵义黎氏	刻本	《古逸丛书》本
9	文馆词林:残14卷	清光绪10年(1884年)日本遵义黎氏东京使署	刻本	
10	影旧钞卷子本文馆词林:存13卷	清光绪10年(1884年)遵义黎氏	刻本	浅草文库本
11	文馆词林:存5卷	清光绪29年(1903年)杨氏景苏园	刻本	
12	文馆词林:存19卷	民国(1912—1949年)武进董氏	影印本	董康本
13	文馆词林:存18卷	武进董氏	影印本	
14	文馆词林残卷	日本小林忠治郎	影印本	
15	文馆词林:存29卷	民国3年(1914年)乌程张氏	刻本	《适园丛书》本
16	文馆词林:残23卷	民国3年(1914年)乌程张氏	刻本	
17	文馆词林:残23卷	民国3年(1914年)吴兴张氏	刻本	

下面对上述几个本子分别阐述。

(1)《佚存丛书》本。作为最先刊布的、日本学者的辑佚成果,编号第5的本子应该说最能代表《佚存丛书》一系的特点。细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大字清晰,书品上佳。另外,此4卷残本书前有“宽政辛酉二月上浣四日天瀑山人识于听雨书屋”之序言,卷末附题为《书<文馆词林>后》的跋语一篇,语称“庚申岁清明月之八日天瀑识”^[5],俱为林衡(字述斋,号天瀑山人)所作,对于了解这套丛书的刊刻始末抑或是《文馆词林》其书,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佚存丛书》系统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本子就是编号第2、光绪8年(1882年)长洲黄氏刻印的活字本,也是上表中唯一一个在版本类别上也做到完全仿制的特例。此书卷首有“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季冬之月长洲尤炳奎序”,当中提到刻书者黄润生是继承其兄黄灿生的遗志翻刊此书^[6],似乎正可说明此本从内容到形制都秉承《佚存丛书》原样的深层缘由。遗憾的是,该书现已四周泛黄,穿线亦有松落,保存状态似不甚乐观。

(2)《粤雅堂丛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共藏有4份,均呈现为4个残卷编为一册的面貌,但整体书品却与其刊刻所本——《佚存丛书》本大相径庭。具体来说,此书字体似手书上版,有些随意,而用墨又不甚匀称,使得无论是文字还是边框,都表现得浓淡颇为不均,粗细太过分明。特别是版框和界栏,还间有歪斜以及中断等情况,而书于版心下方的丛书名称,也出现了字迹漫漶的现象。至于书后附录,此本兼收了林衡的原跋和阮元的提要。另外,出资刻书的伍崇曜,也于卷末撰文叙及刊刻因缘道,“两书^②皆亡友黄石溪明经钞存之帙,其见于《佚存丛书目》各书当更搜全之。咸丰癸丑荷花生日南海伍崇曜跋。”^[7]

(3)《古逸丛书》本。历来就是14卷的面貌。所以表格中编号第8的15卷本实在不能不引人注目,尤其是书套外煞有介事罗列出的15个数字里,有一个在该书研究史上前所未见的卷数赫然在目。只可惜核对原书后方知,这纯粹是个莫名其妙的笔误,神秘的卷“一七八”不过是子虚乌有。而笔者还发现此本另有一问题在于,卷665后有“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福写”之字样,易于辨认,董康也曾于日记中提及,“曩见高野山藏《文馆词林》,间有题仪凤二年书手吕神福写者”。^{[4]106}但杨守敬在卷末为之作跋却称,“彼国所得实为足本,今校其所存各卷,门类繁多,不

尽规试之辞,且第665卷后有‘仪凤二年书手李神福写’字样,是更在垂拱以前,其非删节之本无疑。……光绪甲申二月宜都杨守敬记。”^[8]未知一姓之差缘何而来。除此跋语以外,书后尚有日人“小林辰所得元禄间钞本《文馆词林》目录”,以及《经籍访古志》为《文馆词林》残卷所作的提要。另需一提的是,同属《古逸丛书》系统的第10号本子,纸张脆薄发黄,书册边缘已逐渐开始剥落,就目前所见,上册的封皮业已残缺不全,保存状况亦令人忧心。

(4)浅草文库本。该本为笔者自主命名。由于它常以上一版本的附属姿态出现,五卷单刻本似乎并不常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也仅有11号一种。此本分上下两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右下多注有刻工名号(如心田、槐山、翰卿等),但又非绝对(例如卷346共23页,其中间注守月、云山、守日、心田者各两页,其余则留白);版心左上则标记当页字数。该书用纸标准不一,纸张有厚有薄(例如卷346第6页的纸张厚度就明显与前后页大不相同)。而其书前既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章,又有杨守敬癸巳四月之序言的手写稿,这些都是不见于他本的特别之处。

(5)董康本。经由董康访回的《文馆词林》残卷,分别有卷152、156~158、160、346、347、453、457、459、664~667、669、670、695、699共18卷,其中卷158和664缺首,卷666、669及670缺尾,其成果可集中见于第14号本子,乃日本人小林忠治郎以玻璃版、大开本印制。董康曾说,“小林者,业写真版。余曩时印玻璃版各书,皆其所制,为海东第一名手。”^{[4]1-2}今观其书,方知此言不虚,无论是纸质、品相或者整体效果,此一版本都堪称佳作。可以推断,这正是前文引用过的《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一文中,作者“挽小林氏印制”的版本之一了。

(6)《适园丛书》本。以15号为代表。此本实际题为《文馆词林汇刻——杨氏、<佚存>、<古逸>及新出钞本》,顾名思义,亦可略知其收录详情。其书有杨守敬作序,并附林衡的《书<文馆词林>后》一文。需要澄清的是,这个本子被当作29卷收藏,书前却有“文馆词林汇刻廿八卷”的签章,但本身含量却只有23卷。多出上述董康版本的部分,分别是卷414、452、662、668和691。这个数量上的误差看似荒谬,其实也很好解释。因为和《古逸丛书》本后杨守敬的跋语一样,张钧衡在为此书作跋后也引用了所谓小林辰访得

的目录,其数目不多不少,恰为29卷。窃以为铃印之人可能迷失于此,编目之时则因袭了旧误。

3 结语

事实上,真正多达30卷的《文馆词林》出现,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将日本国各文库、古刹名寺及私家珍藏及中土传刻的弘仁钞本及弘仁本之影钞本、摹写本、摹刻本搜罗殆尽,择善去重,汇为一编,得三十卷(其卷次不明之残简亦按一卷计),影印出版,是乃迄今为止收文最多,版本最善的一个印本。”^[17]到了今天,又有学者以这部《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为基础,不断进行着有限文本背后的深入研究,实在是《文馆词林》一书几近失传之不幸当中的大幸。但与此同时,现代整理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造成了对于古书实物的冷落,特别是那些虽属古籍却又难以被划归为善本系列予以重点保护的对象,乏人问津成了尴尬的现实。然而正如《经籍访古志》所言,此书“虽零卷残轴所存不多,实可保重

矣”^[9]。应当说,能够在一间图书馆里历数一部“死而复生”的古书在版本史上的所有发展阶段,实属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回顾并记住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无论是对那些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抑或历经长河传留下来的书与智慧,都是种必要的尊重。

孙钦善先生曾在不久前于《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展古文献学、加强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是重要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其载体——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而对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又必须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见,古文献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这也正是本文梳理和介绍《文馆词林》版本情况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珍视古籍、保护古籍,既是对文明的继承,也是对文化的弘扬。

注释:

- ① 相关论著一般将这次刊刻作为《古逸丛书》本的补充加以介绍,意其时间相近、经手人相同之故。但本文为叙述便利,暂以其来源命名之。
- ② 指《文馆词林》和《两京新记》。

参考文献:

- [1]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656.
- [2] 阮元.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1217.
- [3] 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4] 董康.董康东游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5] 许敬宗.文馆词林:残4卷[M].刻本.1789—1817(日本宽政至文化间).
- [6] 许敬宗.文馆词林:残4卷[M].木活字本.长洲:黄氏,1882(清光绪8年).
- [7] 许敬宗.文馆词林:残4卷[M].刻本.南海:伍氏,1853(清咸丰3年).
- [8] 许敬宗.文馆词林:残4卷[M].刻本.遵义:黎氏,1884(清光绪10年).
- [9] 贾贵荣.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一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426.
- [10] 孙钦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发展古文献学[N].人民日报,2017-05-22(16).

作者简介:刘育(1984—),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青海大学讲师。

收稿日期:2017-05-05